

规范变迁 与 身份再造

主权零死亡时代
大国崛起战略之路径重构

姜鹏/著

*Reconstruct the Rising Strategy Path
in no Sovereignty-death Era*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规范变迁 与 身份再造

主权零死亡时代大国崛起战略之路径重构

*Reconstruct the Rising Strategy Path
in no Sovereignty-death Era*

姜鹏/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规范变迁与身份再造:主权零死亡时代大国崛起战略之路径重构 / 姜鹏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2

ISBN 978 - 7 - 5161 - 5391 - 8

I. ①规… II. ①姜… III. ①世界史—研究 IV. ①K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06907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杨晓芳

责任校对 许晓华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大街 100720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1

字 数 303 千字

定 价 6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2500年前，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著名论断：“雅典权力的日益增长，由此引发了拉栖代梦人的恐惧，从而使得战争不可避免”^①，第一次将权力的结构性矛盾引入到对国际问题的探讨之中。此后，关于新兴崛起国与守成的霸权国之间是否会不可避免地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与“大国政治的悲剧”成为了国际关系理论中一个重要命题。

奥根斯基（Organski）和库格勒（Kugler）在其共同的著作《战争的分类》中认为：“崛起国经常对现有的秩序安排存在不满，并且愿意发动战争重塑国际秩序与机制。”^②并进而认为：“如果崛起国力量增长到霸权国力量的80%，则霸权国就会将崛起国视为现存国际秩序的‘挑战者’与领导地位的‘竞争者’。”^③奥根斯基在《国际政治》一书中阐释了“权力转移理论”与体系权力结构变迁问题。他认为：“由于体系权力结构决定了利益的分配结构与原则，因此，崛起国便试图寻求

① [古希腊]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徐松岩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版，第51页。

② Organski, A. F. K.,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 358.

③ Organski, A. F. K.,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p. 19-20.

基于新的权力分配基础上的国际政治话语权与利益的重新分配,成为现存秩序的挑战者。”^①这将导致崛起国与主导霸权国联盟的不可避免的结构性的矛盾。罗伯特·吉尔平认为:“旧霸主的衰落与新霸主的崛起必然引起争霸战争。当一种历史根本性趋势开始变得明显之时,权力结构中的上位者会感到恼怒与恐惧,并发现时间与优势愈发朝着不利于自身的方向持续发展。因此,权力结构的上位者都存在着先发制人的冲动来避免优势的流失与权威的溃散。”^②乔治·莫德爾斯基在其“历史长波理论”中认为:“由于霸权国位置更替的周期呈现出规律性,‘全球争霸战争’也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新旧霸权的这个周期大约为一个世纪。”^③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则直接断言: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因为他对国际政治的看法带有浓重的悲观色彩,坚信大国政治是零和游戏,同时,美国在东亚采用的“离岸平衡手”战略可能加剧中美之间的敌意螺旋。^④结构现实主义大师肯尼斯·沃尔兹同样认为:权力的“结构性”对单元行为选择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体系的“结构性”使得霸权国及其联盟会采用“均势”与“制衡”来应对崛起国的权力上升。阎学通先生更是直接指出:“一个国家越强大,面临的安全问题越多。我国从2010年开始出现外交困境,主要原因是国力的提升加深了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⑤

本书所要重点探讨的问题在于:是否在历史上所有的崛起大国都会

① Organski, A. F. K.,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68. pp. 52-58.

②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ing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201.

③ George Modelski,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7. George Modelski, "The Long Cycle of Global Politics and the Nation-stat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20, 1978. pp. 214-235. George Modelski, "Long cycles, Kondratieffs, and Alternating Innovations: Implications for US Foreign Polic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1981. pp. 63-83.

④ 2013年11月2日在清华大学召开的“Can China Rise Peacefully? 中国能否和平崛起?”会议上,阎学通与米尔斯海默就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进行了辩论。上面的引用是米尔斯海默在本次会议上的观点。http://ethics.hunnu.edu.cn/show_content.php?id=515

⑤ 2013年1月25日召开的冬季达沃斯经济论坛上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认为,我国国力的提升加深了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而随着我国国际地位上升,原有的外交政策急需调整。<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hgds/20130125/111514403319.shtml>

受到体系霸权国及其联盟集团的权力防范与战略遏制？如果不全是，那么什么样的崛起国成功地摆脱了霸权国的战略围堵与遏制？这些在历史上成功地摆脱霸权国遏制的新兴大国在其崛起战略的路径规划中存在着哪些战略共性？国际社会的规范进化能否为崛起战略理论撕开新的创新空间提供可资借鉴的研究路径与视角？在现代国际社会，海权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所承载的更大文本意涵究竟是“海运能力”还是“海军实力”？海权战略是否应该从属于国家崛起之整体战略？军队应该是国家实现战略的工具还是国家制定战略的主人？一个国家的和平发展战略实施是否可以不付出任何代价？

带着上面的疑问我们可能为研究这一问题寻找了一些新的启发。例如：秦亚青先生认为：“在洛克体系成熟发达阶段，国家的最高利益并不是生存。相反，国家的最低需求才是生存。”^① 崛起国不仅面临着历史经验的“驱动”，也面临着创造和平未来思想的“引导”。“历史的真实”与“逻辑的真实”在继承与变革中交汇分离，构成了研究大国崛起路径变迁的思想基础。历史既可能成为开启我们智慧的钥匙，也可能成为束缚我们思维超越“路径依赖”的绳索。人类观念的进化让我们对未来国际社会的和平前景寄予了更大的期待。但在接受与理解国际体系文化进化的问题上，人们却永远也无法在时间上同时步入到一种新的共识殿堂。作为触碰到学科最前沿的国际关系理论家们，只有“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并首先在观念上跳出大多数人所长期信仰的托勒密“地心说”理论，才能够率先看到布鲁诺所证明的“日心说”理论的合理性。在新的理论价值与正确性被实践一再反复证明之前，绝大多数人还是会被巨大的历史惯性与思维的认知闭合推向现实主义权力政治信仰的黑洞。要想摆脱此等大国间政治魔咒对观念的束缚，并跳出现实主义权力制衡宿命论的死循环，就必须有勇气和魄力将充满冗余数据的旧思想系统重新格式化。正如地上有一个坑，昨天有人掉下去了，今天又

①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反思与重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4页。

有人掉下去了,明天还会有人从这里走吗?根据历史归纳的方式和认知惯性,从实然层面预测,明天还会有人继续掉下去;从应然层面讲,明天人们就不应该从这里走了。但是,也许明天这个坑就被填上了。而这就是逻辑的力量。历史归纳与类比作为最朴素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方法,它在逻辑上的最大缺陷就是归纳永远都无法周延。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用过去历史上曾经有过多少带有明显霍布斯主义血腥杀戮与殖民并吞的“历史的真实”去否定未来国际社会向善发展的“逻辑的真实”的可能性。

刘雪莲先生也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实现国家利益的方式、手段必须与时俱进地改变……长期以来,许多国家将弱肉强食视为无法改变的国际斗争规律,但是,在全球化时代,传统的那种‘不问手段,只讲目的’的‘权力博弈’原则已经愈发过时,越来越多的国家领导人意识到武力并非是获取与维护国家利益的最有效手段。”^①事实上,如果崛起国并不打算通过武力去威胁他国,或运用武力去推翻或重构现有的国际秩序——事实上崛起国和霸权国都是现存秩序下最大的受益者,而且崛起国的横向增长速率一定高于霸权国才能实现二者权力位差的收窄——那么就没有必要担心在安全与生存问题上会遭到霸权国及其联盟的赤裸裸武装侵略与并吞。如果霸权国防范的不是崛起国单纯的权力增长,而是崛起国打破现状和重构现有国际秩序的战略意图,那么从崛起国角度讲,在崛起进程中,尤其是初段和中段进程中,适当地降低自身的军备水平往往可能增加而不是降低本国的安全剩余。就像“二战”后重新实现民族崛起的德国与日本一样,低军备增长率的“非军事崛起战略”^②不仅能够降低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陷入敌意竞争螺旋的概率,同时也能够为崛起国将更多的权力要素投放到其他影响国际关系和

① 刘雪莲:《政治与全球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2页。

② “非军事崛起战略”这一概念由清华大学阎学通先生最早提出。具体参见:阎学通:《美国霸权与中国安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页;也可参见阎学通:《国际政治与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4页;刘万文:《21世纪初期中国的国际环境研究》,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0年版,第26页。

提升本国综合国力的重要领域之中。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终身教授理查德·罗斯克兰斯 20 世纪 80 年代在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战略选择与崛起成败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国家崛起可以选择传统的军事征服，也可以选择经济贸易。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奉行“殖民立国”的崛起战略，在亚洲太平洋疯狂的武力争夺，却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二战”后的日本选择了“贸易立国”的崛起战略，短短 20 年间再度实现了国家与民族的重新崛起。德国的例子更是如此。罗斯克兰斯就此得出一个关于和平崛起战略的重要结论：“‘二战’后，国际社会中出现的一个有趣变化就是贸易与投资战略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着更大的现实可行性。通过生产发展与技术革新，而不是传统的军备增加，许多国家改变了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和影响力。通过贸易，而不是军事征服，国家在合作中获得了更大的利益。”^① 罗斯克兰斯研究的“二战”后联邦德国和日本的再度崛起是否能够为我们研究体系文化变迁背景下大国崛起战略的路径重构问题提供一种可能摆脱与霸权国陷入安全困境与战略互疑的新思路？

乔治·莫德爾斯基在考察了欧洲地区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格局后总结出的“长波理论”认为：“近 500 年来，霸权国的直接‘挑战者’大多都遭到了来自霸权联盟的绞杀而在崛起进程中失败”。^② 纵观国际关系史可以发现，崛起国面临的安全压力从来不是仅仅来自霸权国一个国家，而是整个霸权的联盟体系。所以单纯地比较崛起国与霸权国两者之间的权力位差是否忽略了更大的权力结构？本项研究认为，在洛克体系文化下，崛起国选择“安全搭车战略”无疑是一种比“安全自助战略”

① Richard Rosecrance,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p. IX.

② George Modelski,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7. George Modelski, "The Long Cycle of Global Politics and the Nation-Stat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20, 1978, pp. 214-235. George Modelski, "Long Cycles, Kondratieffs, and Alternating Innovations: Implications for US Foreign Polic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1981, pp. 63-83. 转引自姜鹏：《结盟均势理论中的“三明治”结构与大国崛起成败的实证分析》，《太平洋学报》2012 年第 10 期，第 24 页。

风险和成本都更低的战略。

如果说门罗主义所强调的“手拿大棒，高声说话”代表了权力政治时代崛起国的典型特征，那么，“手拿大棒，轻声说话”往往会比前者表现得更加明智与受欢迎。一个四处耀武扬威的崛起国往往会给自身的崛起进程招来不必要的麻烦，而一个懂得自我约束和“韬光养晦”的崛起国往往会得到霸权国更多的绥靖与认可。“如果大国崛起给其他国家带来了明显的威胁感并因此而受到戒备与防范，无异于是一种自拆台脚的愚蠢策略。四处争夺利益、到处展现实力和无视霸权国地位的激进行为将导致一个不远的遏制性联盟的形成与围堵。”^① 克劳斯·爱波斯坦在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因的时候认为，威廉治下的德意志的国土面积、地缘结构、人口数量、经济实力、浪漫主义德国传统哲学夹杂的国家主义思想、军国主义情绪，统统上述一切在一个充满神经质与难以琢磨的皇帝的指挥下不可能不使欧洲国家感到恐惧。“作为一个需要朋友和归属感的巨人，德国没有牢记权力的声望在于审慎，而是继续在欧洲和世界的四处点火，这为自己在短短二十年间实现全面的“化友为敌”提供了充足的解释和证据。”^② 无独有偶，德意志民族缺乏节制力的缺点在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有人认为，如果希特勒在德国取得苏台德区以后，甚至是兼并奥地利以后马上死去，那么他将会成为德意志历史上最伟大的天才政治领袖。但是，正是由于缺乏节制力，希特勒的不满逐渐使愿意对其绥靖的英法愈发看清其打着“联系性崛起战略”的幌子，实行“变位性崛起战略”的事实。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奉行“审慎的权力原则”，并严格为自己的进退设定好“战略止进点”与“战略止损线”，或者设置了过高的“战略止进点”与“战略止损线”，那么就很容易陷入看似毫无目标的无限扩张之中。最后就如

① 姜鹏：《结盟均势理论中的“三明治”结构与大国崛起成败的实证分析》，《太平洋学报》2012年第10期，第24页。

② Klaus Epstein, "Gerhard Ritter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3, 1966, p. 293.

水中的涟漪，无限地扩张自己，最终消失在无限里。

亚历山大·温特认为，传统现实主义理论所描绘的国家间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已经无法准确地反映出当今国际社会的现实。与过去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相比，我们正在进入到一个“主权国家零死亡”的新时代。在冷战后洛克体系文化成熟发达阶段，如果尼加拉瓜总统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担心他的国家会不会因为弱小而被霸权国美利坚所灭掉，那么这种明显脱离了现实经验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种不现实的现实主义。长久以来，我们总是在强调“落后就要挨打”，这种霍布斯主义的观念结构可能更适合于1840年的权力政治时代或秦灭六国的战国时期。现代国际政治随着“民族自决”、“主权独立”、“战争非法”和“集体安全”等规范的深化，既使得非洲的许多落后国家并没有因为其“落后而挨打”，也使得像美国这样一个霸权国无法灭掉一个阿富汗或伊拉克这样虚弱的敌对国家。由于中国近代的历史原因、在全球化进程中受创伤产生的心理落差，以及国民教育中对屈辱感不停地再现强化，使得我们的民族总是更倾向于相信“强权即是真理”的权力政治观念。如果未来我们相信权力仅仅是一种手段，安全本身才是目的这一论点，那么，在这个主权国家的零死亡时代，我们就可能基于更大的文化容量而选择更加温和的“联系性崛起战略”，而不是“权力转移理论”所预言的“变位性崛起战略”。

通过进一步地研究“体系规范变迁与大国崛起战略路径选择”之间的二元关系，本书发现：在主权零死亡时代，崛起国家与守成国家间的互动模式并不单纯取决于权力的“结构性”碰撞，而且更取决于互动行为体所处的体系文化及其影响下的权力的“关系性”建构与“进程性”演变。体系文化的进化导致了单元间角色身份的演变，单元间角色身份的演变又引发利益认知的转变，利益认知的转变再引发单元间互动逻辑与行为模式的变革，进而影响到大国崛起战略路径与手段的选择。随着洛克体系文化及其主导逻辑在主体间不断地深入内化，国际政治的互动模式也发生了三点明显的变化：第一，“文化选择”模式取代

“自然选择”模式;第二,“市场分配”模式取代“权威分配”模式;第三,“位形性战争”模式取代“构成性战争”模式。^①在此基础上,冷战后时代的国际政治也愈发表现为“主权国家零死亡现象的突显”、“军事权力要素单独发挥影响力的式微”以及“大国无战争时代”^②等新的特征。体系文化容量的增加为国际关系互动提供了新的话语符号系统与文本理解形式,并进而为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消除战略互疑、降低安全困境、开展良性互动、重塑角色认知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比从前更大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空间。

在擘画未来的战略大棋局进程中,善弈者谋势,不善弈者谋子。这就要求我们在战略问题上能够做到统观全局,把握趋势,胸怀世界,登高望远。政治学获益逻辑与经济学或军事学的逻辑有所不同,它是在曲线中谋求国家利益。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以权相交,权失则弃;唯以心相交,友不失矣。欲将取之,必先予之。故大国崛起之根本在于人心所向,因而不应像小商人一样囿于一城一地之短期得失。理性指导下的大国博弈并不能达到一边倒式的理论上的最优解,而是仅仅能够达到一个基于博弈“均衡值”而产生的次优解。真正的大国间利益博弈必须建立在相互妥协的基础上才能寻找到认同的最大公约数,而真正好的谈判结果必须是双方“既若有所得,又若有所失。既不十分满意,又无法拒绝”的一种情形。因为,毫无妥协并完全有

① 姜鹏:《超越“西叙福斯的苦役”:中美在朝鲜半岛政策分歧的反思与出路》,《当代韩国》,2013年第4期,第30页。

② “大国无战争时代”这一命题主要借鉴了清华大学杨原的学术观点。具体参见:杨原:《大国无战争时代霸权国与崛起国权力竞争的主要机制》,《当代亚太》2011年第6期,第6—32页。《武力胁迫还是利益交换——大国无战争时代大国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核心路径》,《外交评论》2011年第4期,第96—116页。另外,杨原与陈寒溪在《外交评论》2012年第1期进行过一场关于《当代大国行为发生了本质变化?》的论战。针对陈寒溪对当代国际关系互动形式是否发生了质变的质疑,杨原进行了回应并认为:“体系进化的大趋势是暴力掠夺和武力冲突越来越与时代的道德标准相背离,基于利益交换的市场原则氛围将越来越浓。”“陈寒溪强调的物质实力决定国际行为的观点与大国无战争命题并无矛盾之处,在当代国际社会,实力仍然是影响力的基础,问题在于究竟用实力来胁迫他国成为国际社会的威胁,还是用实力去增进国际社会的稳定。对权力背后的意图考虑,比单纯地考虑权力结构更成熟。”参见《外交评论》2012年第1期,第155—159页。

利于一方的“凡尔赛和约式”的结果往往会因不利的一方要么怀恨在心伺机报复，要么无力履行而变得难以真正实现。尤其是在主权国家零死亡时代，当一种信念或仇恨被转化成在两个民族代际间无限传承的历史使命，则这种“马拉松式的”战略博弈就更需要建立在相互认同与共赢的基础之上。

和平崛起战略本身不可能是无代价或无成本的。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韬光养晦”与“和平崛起”战略当推“以越吞吴”的经典案例。十年生育、十年教训，最终“吴为其下矣”，吴国被弱小的越国所击败。在这漫长的二十年中，越国唯一的战略目标就是“吞吴”。为了达到“吞吴”的根本战略目标，这个国家在二十年内压抑了无数的看似合理的政策需求。从现有的史料中不难发现，为了实现最终的崛起目标，越国主动地以“空间换时间”的方略放弃了许多正当性的国家利益。在达到终极战略目标的进程中，为了保证最大限度地和平崛起，政策本身向战略做出了最佳匹配的取舍与妥协，使得一切能够迷惑吴国的政策都得到了放大，一切可能使吴国对自身防范与戒备的政策要求都被国家所压抑。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很难讲哪些具体的政策是错误的，只能说它们是不符合整体战略所需要的。而当前我国和平崛起战略中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并不愿意牺牲任何一项具体的政策来确保安全搭车与推责战略的实现。如何用战略利益来规约不同利益部门的政策取向对于中国未来长远的发展至关重要。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未来中国高质量的外交必须超越小商人式的工具理性思维算计。正如英帝国高质量的外交均系出自于传统贵族主政时期，而英国在“一战”后外交的急剧衰落也正是因为以斯坦利·鲍德温和内维尔·张伯伦等为代表的商人家族进入到几百年来贵族把持的外交格局之中。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认为：“欧洲已经实现了和解，但是亚洲的今天正在经历着欧洲的昨天。中国如何处理与周边国家的相关争议，将影响世界对中国崛起的看法……中国应该通过温和的言论和自我克制的行动来展示强大的自己本

身并无恶意,唯有这样才可以消除其他国家对中国强大后的疑虑。”^①

整个近现代中国的复兴与崛起的历史就是围绕着“我们能超过西方吗?”这样一句话进行的。在这样的思想中,马克思主义与国家主义出现了一种强大的合流——中国民族主义思潮。而这种民族主义思潮最典型的一个思维表现就是“仇视西方”。我们特别渴望学习西方,进而打败他们。我们学习的目的不是同西方合作,而是“打败”西方。近代以来我们强烈要赶超西方的这种观点使我们的现代国家观迟迟没有建立起来。在非常强烈的持续的民族危亡感压迫之下,我们接受了威权主义的思维逻辑,也接受了我们中华体系同外部世界尖锐对立的一种基本格局观念。所以,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自然倾向于一种高度敌视性。我们总是倾向性地认为外部世界是充满恶意的,在这种被迫害妄想症影响下,我们特别希望在击败西方的这种情况下来恢复我们的民族自尊。所以,很难认为我们在身份上融入到了现代国际社会的主流之中。

关于转变身份、参与国际合作,进而形成秩序的这样一种观点在当今的中国并没有一个足够大的信众市场。在当今中国的政治势力中,很少有哪一派真正地相信并希望通过身份转变融入国际社会主流之中,从而建构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合法成员身份。事实上,中国至今的政治体制中还没有为这样一种派别提供足够的生存空间。不论蒋介石还是毛泽东,都认为外部世界是压迫我们的。而在这种思想下,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看法自然就是“不是我打倒你,就是你打倒我”这样的一种丛林逻辑。上述问题虽然事出有因,但是它在事实上延缓了我们国家身份现代化的步伐。因为,中国人很少能在骨子里认同外部世界。大家总是抱着一种挑毛病的心态,所以每当看到西方社会有事,我们的国民总会心中窃喜。如果我们总是想通过击败强者的方式来获得国际身份,那么这样一种方式远比获得国际社会身份本身对我们的影响更大。我们的民族主义本质上是渴望用一种让西方臣服的方式来重建我们国家的身份。而这

^① 新华网:《李显龙:中国或得到钓鱼岛 但会输掉世界地位》,2013年8月21日。<http://news.xinhuanet.com/yzyd/overseas/20130821/c-125219908.htm>

种方式会影响到我们的外交理念，使我们的外交政策与国家战略的出发点陷入对立与不合作的逻辑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 70 年了，但是那个时代的危机意识却从来没有从现代中国孩童的记忆中离开。那个时代的创伤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心中定格得太久远了。直到今天，它仍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世界观。我们从未真正地跳出过近代这种对立的二元结构。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这么长的时间里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没有长大。从每天报纸宣传到电视剧滚动播放的节目中可以发现，我们一直没有从那个你死我活的抗争时代走出来。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从那个时代走出来？我们走出来的意义又在哪里？宽恕的前提不是日本人的忏悔——没有任何逻辑能够证明只要忏悔就一定能得到宽恕——宽恕的前提是我们自己的成熟与自信。宽恕不是放别人一马，宽恕是放我们自己一马。如果今天的我们同一百年前的中国人的想法还没有任何区别的话，那么背负历史包袱的我们的未来将朝哪儿走？

一个民族从成功到成熟依靠的不是一次次胜利的欢呼，而是一次足以痛彻心扉的失败。英帝国的成熟是在北美独立战争之后，俄国人的成熟是在阿富汗战争与苏联解体之后，日本与德国的成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利坚民族的成熟是在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之后。只有苦难才能使盲目乐观的大国学会反思与醒悟。作为一个需要朋友的巨人，中国应当在整个崛起进程中尽量奉行权力的自我约束，增强战略定力，提升包容程度，时刻戒骄戒躁。“骄”容易刺激到相对衰落的霸权国敏感神经并导致周边国家的离心倾向；“躁”容易提前诱发一场既打不赢又输不起的体系战争。应该时刻牢记“‘手拿大棒，轻声说话’比‘手拿大棒，高声讲话’的门罗主义更加能够赢得权力的声誉与朋友式的信任；而把大棒放在家里不到处炫耀则更需要智慧、信心与勇气”。^①应当记住：“军事战略应是实现整体战略的工具，而不应成为整体战略规

^① 张丽华、姜鹏：《东北亚地区海权争端现状及对策分析》，《东北亚地区政治与安全报告黄皮书（201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31 页。

划的主人。国家也必须愿意在崛起的大趋势面前对一些并非至关重要与紧迫的问题学会妥协。”^① 只要时间的天平仍然是不断地朝向崛起的中国一侧倾斜的这一前提成立,那么我们国家战略中最需要的就是在审慎、耐心与节制的大国心态规约下,等待水到渠成与实至名归的和平崛起。

^① [美]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86—587页。

开场白

荒岛上的故事

那是一个漆黑的风狂雨骤的夜晚。强劲的大风激起巨浪怒涛，一艘小渔船费力地挣扎在汹涌澎湃的大海中。突然，船的轮机舱发生了可怕的爆炸。所有的灯光都熄灭了。随之，船上的动力系统也坏了。大家一片恐慌，并四处奔逃。甲板慢慢地向一侧倾斜，水手们在船长的命令下开始忙着穿救生衣。在船身最后猛地一歪并沉入惊涛骇浪之后，只有三个水手被冲到了附近的荒岛，其中一人就是本书的读者你。故事就从你们这三个幸运的水手们开始讲起。

为了生存，你们三个幸存者必须要合作去寻找食物和建造房屋，如果可以的话，你们还要为未来可能的离岛做好建造小船的准备工作。但是有一天，另外的两个人因为应该由谁来领导大家并分派工作而出现了争执，并且扭打在了一起。其中一人膀大腰圆，而另一人骨瘦如柴，这个时候你应该去帮助谁？如果根据“权力均衡”的原则，你应该是帮助那个骨瘦如柴的人去制衡那个膀大腰圆的人，以此确保没有人的权力可以凌驾于另外两个人之上。

如果我们再加入一个新的条件进行探讨，那就是在许多年的交往中，大家对彼此的为人形成了一个稳定的认知，即那个膀大腰圆的人平日里像佛一样安静，他为人谦和、经验丰富并且深得船员们的敬重，而那个骨瘦如柴的人却像“疯狗一样”性格乖戾。他平日懒散且酗酒成

性，且经常无缘无故地找碴儿斗殴。这个时候你又应该去帮助谁？

在上面的基础上，如果我们再加入一个新的条件，即那个骨瘦如柴的人虽然像“疯狗”一样整天暴躁易怒，但是他是你的亲弟弟，而那个膀大腰圆的人虽然很温和，但是却与你毫无亲缘关系。这个时候你又应该帮助谁？

如果有一天，当你躺在海滩上享受着阳光的宁静与海风的洗礼，膀大腰圆的人拿着一把海员匕首向你走来，这个时候你会不会害怕？你可能不会害怕，因为在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之下，你大概可能会假设他刚刚在找椰子树或者要去砍一些做晚饭的树枝；如果我们换一个条件，即在月黑风高、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同样是那个膀大腰圆的人手里握着海员匕首向你走来，这个时候你会不会害怕？你可能就会感到比白天时候更大的恐惧了。因为你们互动的背景环境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直接影响了你们之间的互动逻辑和对危险的感知预期；如果我们再换一个条件，即虽然是月黑风高、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如果拿着海员匕首向你走来的是你的亲人，那么，你会不会害怕？你可能就不会感到害怕了。

上面所假设的问题分别对应着“权力的结构性”、“权力的进程性”与“权力的关系性”。我们可能会发现，国际社会中的互动逻辑与行为选择并不像“结构现实主义”所声称的单纯地由物质实力的分布所决定的。在多次重复博弈中所形成的“进程性”与国家间亲疏远近的“关系性”可能对国际关系中的互动有着更大的解释力。从某种意义上讲，观念与意图赋予了物质实力以社会含义。这正如一柄宝剑，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关键在于握剑的手。研究物质实力本身的大小并不直接构成国家间战略选择的根本逻辑，就像“英国有 250 枚核弹美国不认为是威胁，而朝鲜哪怕只有一枚核弹美国都会害怕”一样，权力之间的“关系性”与权力背后的意图决定了国家间的行为选择。

当今的国际政治倾向于在片面中谋求深刻。这种片面的代价就是只关注“权力的结构性”而将不可计量的“进程性”与“关系性”排除在解释变量之外。这样做的问题在于，如果国际政治理论仅仅是研究一